

吳佩孚的一生(三)

孫運開

落難入川淡泊自甘

唐生智自退守衡州後，即請求加入國民黨，所部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軍。

民國十五年六月六日，國民政府特任蔣中正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，七月九日誓師北伐。初期作戰方針為：「打倒吳佩孚」、「暫棄孫傳芳」、「不理張作霖」。即以唐生智為湖南一路的前敵總指揮，統轄其本部第八軍、李宗仁的第七軍和第四軍的一部，十日開始進攻，迅即擊破北軍在湘部隊，下湘潭、克長沙；葉開鑫被驅退岳州，向吳佩孚告急。吳立派援湘總司令李倬章，調集鄂湘北軍約十萬人，在汨羅江北列陣，嚴陣以待。八月十五日，國民革命軍再興攻勢，激戰四日，克平江，出通城、蒲圻，斷敵歸路，已進入湖北境內，北軍大敗。

由於李倬章的一再告急，吳佩孚親率勇將劉玉春及部份雄師，南下汀泗橋，與國民革命軍決戰。國民革命軍蔣總司令也親臨前線督攻，自八

月廿三日至卅日，反覆搏殺，數度得失易手。最後國民革命軍終能以卓越的戰術、旺盛的士氣，以少擊衆，大敗北軍，力克汀泗橋。吳佩孚曾手刃撤退的官兵多人，也無法挽回潰敗的頹勢，而退守武昌。

國民革命軍繼續猛進，用迂迴戰術，渡江攻克漢陽，吳軍劉佐龍部反正投誠，靳雲鵬師也生異志，不聽吳指揮。於是吳一退孝感，再退武勝關，部衆不堪再戰，個人威望全失。十月十日，國民革命軍攻克武昌後，東向南昌，進攻孫傳芳，吳才得暫時喘息機會。

雖說，吳在鄭州、洛陽，仍想重整旗鼓，反攻武漢。然而軍費無着，兵將不前；新結金蘭共同討馮的張作霖，竟然下令阻止吳軍渡過黃河，擺出不再合作姿態，張宗昌之流願意出兵援助，也都各具用心。同時他已感覺到大事所趨，國民革命軍一定成功，抗爭無用。於是，他對各方的自請相助，婉言謝絕；對過去受他運用的楊森、王天培、賀耀祖等投誠革命軍，也不加指責。

祇是偏處洛陽，靜觀時局。民國十六年二月八日，張作霖電責他觀望誤事，請他讓路，由奉軍南下與革命軍決戰。他立即回電，阻止奉軍南下，可是，當他五十四歲生日的當天，奉軍竟然渡河南下攻吳。他祇好再度離開洛陽，向南陽前進，準備避往第九軍于學忠的防地。然而，風聲傳播，于已有投奉之說。

因此，當他路過嵩山之時，突然表示看破紅塵，想出家為僧。經過他的夫人（再娶的張夫人）力勸，才打消此意。

到南陽，雖說于學忠仍按常禮親率六名師長來迎，但並無竭誠擁戴，挽留暫住的意態。當時，誠所謂「天涯茫茫，走投無路」。最後還是他自己拿定主意，入川找楊森。

這是一項大冒險，楊森已投効革命軍為第廿軍軍長，立有戰功；如果捉他獻功，豈非自投羅網？但是吳佩孚深知楊的為人和彼此的友誼，決無問題。同時，除此以外，也真的無路可走，無人可投了。

他匆忙離開是非之地的南陽，從小路西行，指望通過他的老部下襄陽鎮守使張聯陞的防區。因為張已投馮玉祥，接受其卅八路總司令番號，所以吳特地派人去向張交涉，請其顧念舊誼，讓他假道渡過襄河，前往四川。

張聯陞假意應允，但等到吳率隨從人員與衛隊渡河時，張却在襄河設伏，邀擊中流，幾乎要了吳的性命。

吳在王家寨突圍後，在張的防區祇好專挑人跡罕見的山路行走，經歇馬河、馬良坪，抵達興山。這一路，是出了名的土匪出沒之處。吳佩孚當然不願與土匪作戰硬闖關，祇好依照江湖規矩，沿途派人手持吳佩孚的大紅名帖，行客拜坐客，沒想到盜亦有道，不肯乘人之危；同時仰贊吳的盛名，又聽說他是入川投楊森作客的；於是不但不搶劫為難，反而派人帶路，供給糧食，請入山寨，小作停留。

到興山，才由張方撥打電報楊森，請其「念在舊日友誼，當此生死關頭，慨然加以援手。」

楊森是一向顧全友道的血性男兒，一面迎吳入川，先往白帝城，再往萬縣；一面電報蔣總司令，准他加以接待。吳也發出通電，聲明他來川祇是遊歷性質，決不過問政事。

吳佩孚在四川過了五年閒散生活，詩酒自娛，接受過川軍各大將領的招待與饋贈，不再過問軍政。民國十九年中原大戰結束，國民政府蔣主席曾派杜錫珪率軍艦二艘，駛抵宜昌，迎吳晉京，擬聘為高等顧問。吳欣然應命起程，但却被扼守萬縣的劉湘部師長王陵基橫加阻撓，不許過境。

吳祇好折回綏定，既未對王計較，也未向蔣主席申訴。

他在四川五年，在白帝城、萬縣、廣安、大竹、綏定等地居住，出版其詩集、蓬萊講話錄，和循分新書等著述，從他的一首「萬縣西山放歌」的詩句中，可以看出他當時的心境：

「馬革餘生何所有？匹馬南來一杯酒，了此殘年福已奇，終覺蒼蒼待吾厚……往事不堪重提起，魂魄收入詩囊裏，世外有世天外天，從前種種昨日死……一樣仰天起高歌，心膽驚時昔枕戈，此後安閒解拘縛，夢裏無復呼渡河……他年容我一杯土，不須伐石墓何所？……」

民國廿年九月，他離開四川赴蘭州，筵席之間，解決了甘肅回漢的嚴重衝突；他勸諭馮玉祥的部將雷中田，釋放回籍的甘肅省主席馬鴻賓，勉勵他們團結一致，服從中央領導。隨即經寧夏、綏遠、山西三省，回北平長住。

「九一八」事變後，日人卯翼薄儀，成立「滿州國」，作為正式侵吞的過渡。吳佩孚激於義憤，不甘緘默，特於民國廿一年三月十日，發表通電，予以申討，所謂：

「：樹置清室廢帝，偽稱滿州獨立國，實為日本之附庸，陽辭佔領之名，陰行掠奪之實。滿州遺族，早在中華範圍之中，乃忽恍於莠言，為敵人所擁立，此與身為戎首，據地

外叛者，初無殊異；亟應同仇敵愾，大張撻伐，對日本則為禦侮之師，對竊據獨立者，則申討逆之義。」

真是義正辭嚴。等到國聯調查團往東北調查之先，路經北平，籍隸英國的團長萊頓爵士曾在中國代表顧維鈞陪同下，拜會吳佩孚。吳再作「致國聯調查團書」，極力主張遵守九國公約，確保中國領土的完整，主權的獨立。

當時，國事蝸蟻，情勢險惡，已經息影的軍政大員大多以為事不關己而三緘其口。吳佩孚仍能不忘國民天職，仗義直言，實屬難能，而且足見其風骨嶙峋。

堅守晚節光榮死所

抗日戰爭既起，平津迅告淪陷，日軍找出一批漢奸，組織偽政權，原係一時權宜之計。等到民國廿七年以後，戰爭已成爲長期性質；於是日本人策訂「以華制華」策略，準備設法扶持一二素著聲威，極具份量的失意軍事領袖或者黨政要人，組織偽政權，與重慶的中央政府對立對抗，自相殘殺，牠收漁人之利。黨政人物，因為汪精衛先已與他們有勾結，所以他們以汪爲對象；軍事領袖，以吳佩孚爲對象。

日人慫恿吳佩孚「出山」，最初以為吳已失勢多年，現在許以權位，動以利害，必然一拍即合。不料吳却提出嚴厲的反要求，要求日軍先退出中國與東北。日人仍不甘心，特務巨頭土肥原，還有已任偽職的齊燮元經常到吳的住處什錦花園料繮，甚至派兵監視（名爲保護），使吳非常困擾

中央知道吳的處境，特派吳的老部下政務處長劉泗英，携帶孔祥熙的親筆函，由重慶開關北上，于民國廿八年元月到達北平，與吳相見。孔的書信情詞懇摯，既關心他的處境，又敬佩他的愛國不撓的精神，並請他多賜救國大計。吳看信後，很欣慰。劉再補充說明中央抗戰到底的決心和誘敵深入的戰略，以及汪精衛出走的內幕。（當時陷區謠傳汪之出走主和，係和中央唱雙簧）吳聽了很感動，當即親復孔一函云：

「庸之仁兄惠鑒：泗英開闢萬里齋到手書，面述尊旨，慰甚。惟剛柔相濟，古有明訓；似相反而實相成。我兄公忠體國，計當出此。弟處境安如泰山，應付綽有餘裕，請釋遠慮，一切詳情，統由泗英面達，此頌籌安，弟吳佩孚手啓，一月十日」

書信寫好，再請劉回重慶後向蔣委員長轉陳三事：修明內政，運用外交，嚴防共黨。隨即賦詩一首，以發舒他對蔣委員長的仰望，詩云：

「颯颯西風裏，秋聲動地哀；
斯民何所恃，端仗大英才」。

土肥原想逼迫吳佩孚出山落水，不擇手段，既偽造吳主張和平的通電於先，復安排一個記者招待會，于民國廿八年元月卅日在吳宅舉行，原想利用翻譯人員「假傳聖旨」的歪曲吳的論點，和他們事先準備好散發記者的書面稿件，兩相印證；使吳在「既成事實」的情況之下，俯首就範；

同時也可收動搖我民心士氣的心戰效果。

可是，吳胸有成竹的沉着應付，當着中外記者一百卅人，簡單明瞭的說出他的和平先決三條件：

1. 日本無條件全面撤兵。
2. 中華民國應保持領土和主權的完整。
3. 日本應以刻在重慶的國民政府為全面議和的交涉對象。

話頭一落，立即叫他的叢秘書大聲譯成外文，無形中否認日人事先為他準備好的書面談話，並且致贈各記者「大丈夫論」一冊，闡明立場。結果，真相大白，謠言平息；土肥原白忙一頓，妄費心機。

汪精衛出走以後，與日人勾結，由於他和日人簽訂的賣國密約被人揭露，而成爲國人皆曰可殺的漢奸，聲望一落千丈，號召力減低，無法達成日人「以華制華」的目標。於是日人慫恿由汪出面拉攏吳佩孚合作，汪乃于五月廿二日，致函吳佩孚，暢論國事，探吳意向；以爲「非恢復和平，無以內除共禍，外應世界大勢」，主張「非組織統一有力，自由獨立之政府，無以奠定和平。」

吳佩孚接到汪的函件，立即批復：「公離重慶，失所瞻依，如虎出山入壘，無謀和之價值，果能再回重慶，通電往來可也。」

汪精衛仍不死心，六月廿六日，親往北平，要與吳面談。吳却以難找適合會面地點爲藉口，讓汪等了半個月，仍然無法見面。汪敗興而返，再派他的親信陳中孚幾次北上，竭盡所能的和吳見

面；傳達汪的合作請求，許以僞國民政府的「軍委會委員長」兼「北平政治委員會委員長」的偽職。吳佩孚除了當場痛斥汪精衛下賤外，並托陳轉送汪一本文天祥的「正氣歌」，用以懲戒汪的變節無耻。

由汪精衛出面邀約吳佩孚合作失敗了，日人又直接出面接棒交涉。最後，由日本駐華派遣軍總參謀長板垣征四郎親自出馬訪吳，表示日軍決定劃出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河南、山東、河北六省之地，交吳主持一切；稱謂名義，概由吳自行定奪，並且希望吳于民國廿九年元旦宣言就職。

日軍此一謀略，是想以六省地盤權利爲釣餌，利用吳佩孚與中央自相殘殺，緩衝國軍的反攻行動；他們好加強對江蘇、安徽、浙江、福建、廣東的切實控制。吳佩孚當然不肯改變初衷的去上當，可是，他也知道，日人如此一再逼迫，自己一再峻拒，終有最後攤牌的時期。因此，他與幕僚判斷中國終必得到最後勝利，但他自己：「無論如何看不見了。」於是，預先留下他準備殉國的「春感九首」絕筆詩。第八首是對蔣委員長的敬佩與寄望，詩云：

欲將詩酒遣良時，遙望南天淚已垂；
一語寄君應努力，滿盤棋局仗誰支？
第九首則自明忠貞不屈的心跡，詩云：

避秦舊地莫重論，渡口雲迷古洞門，
十里桃花紅似昔，還從方寸覓仙源。

日人因爲逼誘吳佩孚出組偽府一再失敗，最後乘吳患牙痛小病之機，托言拔牙，于民國廿八年十二月四日，由日人川本大作少將、大漢奸齊燮元、符定一等闖入吳宅；日醫石田動手行凶，一刀戳穿吳佩孚的喉管，吳遂殉國。國民政府蔣主席在重慶聞此惡耗，特拍唁電讚吳：

「……先生矢志春秋，精忠許國，比歲以還，處境彌艱，勁節彌厲，雖暴敵肆其誘脅，羣奸竭其簧鼓，迄復屹立如山，不移不屈，大義炳耀，海宇蒙欽。先生之身雖逝，而其堅貞之氣，實足以作勵兆民，流芳萬古……」

吳佩孚的家屬奉到蔣委員長的唁電，第一反應，即爲峻拒漢奸政府的兩萬元治喪費；並且設法通過英國的路透社，于十二月十四日，從上海發出專電，報導死難經過。

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于民國廿八年十二月九日，特發褒揚令，追贈陸軍一級上將。令文云：

「故陸軍上將吳佩孚，秉性剛直，志行堅貞，曩年整軍經武，卓著聲稱，而其嫉惡黜邪，持正不阿，尤有裨於世道人心。瀋陽變起，櫻懷國難，恆以精忠自勵，燕京被陷，處境益艱，敵酋肆其逼迫，奸逆逞其簧鼓，威脅利誘，層出不窮，猶能勉全所守，終始弗渝。凜然爲國家民族增重，英風亮節，中外同欽。方冀克享遐齡，長資矜式。迺以微疾溘逝，緬懷忠義，痛悼殊深，應予明令褒揚。交軍事委員會從優議卹，特給治喪費一萬元。生平事蹟，存備宣付史館，用示國家軫念賢良，激勵忠貞之至意，此令。」

抗戰勝利後，民國卅五年二月十六日，國民政府明令公葬吳佩孚於北平玉泉山。

英風傲骨正氣流芳

綜觀吳佩孚的一生，確是中華民國卅年代以前的不平凡人物。

他雖然沒有進過正規的軍事大學，接受過高級軍事教育；但從他歷次戰役所表現的指揮統御才能，從他訓練士卒的著有成效，不愧是一個卓越的軍事家。

曾經在德國學習軍事的段祺瑞，是他的敵人，性情剛強好勝，從不擊節讚人；但却對吳佩孚的軍事才能，不惜一再的公開表示：

「吳子玉作戰很有能耐，不管什麼隊伍，由他指揮，就很可能打仗！」

當王占元北上天津開會後返回湖北，途經鄭州，看到在車站列隊歡迎他的第三師學兵隊，雄糾糾、氣昂昂，雖逢傾盆大雨，仍然整齊嚴肅，面不改色；不覺大爲感動，曾經公開表示：

「吳子玉訓練的軍隊，才是軍隊；咱們是什麼軍隊？」

然而，吳佩孚却不是卓越的政治家。他祇知道忠心上，從一而終；一心一德效忠曹錕，效忠北洋，而未能適應潮流，明辨順逆；把握時機，獨樹一幟，爲達成自己的理想抱負，獨立奮鬥，自創事業。以致受制於曹錕的庸俗貪任，張作霖的驕橫勢利。不但平常他所主張的「精練士卒，統一禦侮、清心寡慾、四維八德」，成爲曲高

和寡的論調；就是他在幾次獲得重大戰役勝利後的政治主張，也因爲未能獲得曹錕和張作霖的竭誠支持而虎頭蛇尾，爲一般貪鄙的軍人和狡詐陰險的政客所抵制所消除。

比如直皖之戰勝利後，他曾提出召開國民大會，解決國是的主張；立即遭受張作霖的反對，不惜針鋒相對的發表通電，強詞駁斥。當他要求解散安福系操縱的新國會，立即遭受徐世昌的反對，即爲顯例。

直奉第一次戰勝，他的聲望更高，發言的份量更重。在他極力主張之下，總算達成他恢復約法的目標，迫使由安福國會選出的徐世昌總統辭職，而迎接息影天津的原任總統黎元洪復職，維繫法統，並希望由此促成全國統一。可是，當他進一步主張：「廢督裁兵，組織超然內閣，召開國會制定憲法，劃分租稅，國稅概歸中央，軍隊歸於國家，軍餉由中央發放」等改革措施時，即遭受各方阻力，而無法實施。結果，不但他自己幾次牽涉到內閣風波之中；甚至被嫉恨者所讒毀，竟然無法勸阻曹錕逼宮賄選，王承斌扣車奪印的醜劇。

政治家需要有人欣服的器度，寬容的雅量，和令人感懷的德政，才能大可久的創事業、立功勳。吳佩孚對部屬的任使升黜，往往臨以軍威，誘以利害；而不從仁德道義上多着力。以致其部屬中的巧詭者，嗜利重於守義，對吳畏威而不懷德。試觀當吳由盛而衰之時，往往有部屬叛變、離德與離心之事。如直奉二次之敗，導因於馮玉祥的倒戈政變；吳浮海南下，籌組「護憲軍政

府」，希望團結直系殘餘力量，與奉系相持到底時，蕭耀南、齊燮元輩的冷淡掣肘，愁玉琨的乘人之危，犯上驅吳；以及革命軍起，吳退守武漢時，劉佐龍、靳雲鵬的叛離等，都是顯例。因而使吳未能在曹錕被囚後，成爲真正接棒的直系領袖。有曹錕在，成爲他的包袱，處處受曹牽制；但沒有曹，又像是缺少什麼，使直系無法鞏固團結，這是吳佩孚的悲哀。

吳有耿介剛直，嫉惡如仇的性格，當其全盛之時，對過訪的政客人士和自己的部屬，往往不假辭色，盛氣凌人，顯得不够雍容寬和。當直奉二次戰敗，吳在浮海南下的華甲輪上，召集幕僚檢討得失時，張其煌就曾勸他今後不但要「改變武力統一的標榜」，而且要「寬待政客要人，苟有主張之士，雖政敵亦敬重之，尤不可斥罵」，「遠佞近賢，多用新人才」。

凡此種種，都說明吳佩孚雖然有些傾動天下的政治主張，但他未能成爲扭轉乾坤、創造時勢的政治家，而擺脫不掉軍閥的範疇。

可是，「時窮節乃現」，他那風骨嶙峋的品格、光明磊落的態度和堅亮正直的氣節，却在他失敗以後，顯耀其光輝。

當直奉二次戰敗，他退守天津時，日本領事吉田茂，找到他的日籍顧問岡野增次郎，告知他有關「馮玉祥、胡景翼、孫岳合兵進逼天津，以及張作霖要取他腦袋」的消息，並且建議他暫退日本租界。他祇禮貌上感激吉田茂的好意，但立即嚴正表示：

「誰要我進租界，我要誰的腦袋。」

當他被國民軍追逐，由鷄公山避往漢口時，蕭耀南居然避而不見，派出人馬，請他住法租界，發表聲明，從此不過問政治，衛隊繳械。當時情勢危急，咄咄逼人；張夫人想一權宜之計，向他建議：「堅持不入租界，但找一前門是華界後門是租界的房子住下；其餘條件照辦。」他斷然表示：「我部下不能繳我衛隊的械，我決不入租界，不論我過不過問政治，不用爲誰發通電」，不屈不撓。

當他自武漢失敗，避居四川，在楊森防地作客時，日本第一遣外艦隊司令荒城二郎少將，和海軍駐滬特務機關長佐藤秀大佐，曾專程自宜昌入川拜訪；表示日軍願協助他東山再起，先貸予私人借款一百萬元，奉送步槍十萬枝、山砲五百門、機關槍二千挺，連同彈藥，運入四川。他慨然婉拒說：「天下事的成敗利鈍，並不在若干枝槍，多少金錢。中國人的事，應由中國人自己了斷；外人盛意，敬謝不敏。」

他自民國十六年入川，一直到民國廿年離川赴西北，四年之中，從不曾開口或命人向楊森要一文錢，要一件東西；楊森始終注意他的實際需要，適時補給，不虞匱乏。「君子之交淡如水」，曾經叱咤風雲的吳大帥，這種徹底放下一切的風範，從他於民國廿一年元月廿一日，回到北平所作的對聯，可見一般：

「得意時清白乃心，不怕死，不積金錢，飲酒賦詩，猶是書生本色。

失敗後倔強到底，不出洋，不入租界，灌園抱甕，真個解甲歸田。」

他的不積金錢，並非徒唱高調。民國廿七年，他曾經親口向他的秘書楊雲史談他的家務：

「早先家裏有幾畝薄田，現在中央又補助三千元，可以過得去了；這年頭，過得去已經有福氣了。」

比起當年一般北洋軍政要員，私產動輒百萬；身爲大帥的他，可謂鶴立雞羣、光耀日月了。所遺憾的他伯道無兒，以他三弟文爭的兒子道時乘祧二房。

他失敗後的倔強到底，最難得的是維持正氣，不爲勢利，不爲利誘。當他被敵人謀害，成仁殉國後，楊雲史曾哭以律詩，悼念他的一生，極爲悲壯確切：

「……談笑揮強敵，將軍繞指鋼，自全惟氣節，無欲便堅剛。虎口定三戒，人心持一匡，蓋棺今定論，與觀太心傷。」

由秀才從軍而統兵百萬。而虎踞中州，關係大局；而失敗入川，飽嘗世態；而視死如歸，全節流芳。吳佩孚的一生，開合起落，波濤壯闊。最難得的，由於長期抗戰，給他一個成仁殉國大好時機和最佳死所。使他平生的志事風骨，有一個塑造典型的好收場。

可是，同一時機，汪精衛却不能保全晚節，而去叛國投敵，結果身死敵國，遺臭萬年。一念之差，生死榮枯，迥然不同。豈不令人不勝感嘆？豈不令人悚然戒懼？

(全文完)